



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

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

陈 杰◎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陈杰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309-13963-1

I. ①十... II. ①陈... III. ①君主制-研究-法国-17 世纪②文学史-法国-17 世纪
IV. ①D756. 521②I565. 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1812 号

十七世纪法国的权力与文学:以黎塞留主政时期为例
陈 杰 著
责任编辑/朱莉芝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73 千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963-1/D · 958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枢机主教黎塞留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央集权化道路上的权力与文学	10
第一节 从“书信集”出版看 1620 年代黎塞留与文人 世界的关系	10
第二节 博瓦罗贝尔,夏普兰与 1635 年的献礼	34
第三节 文人的建制问题:法兰西学院的诞生和年金 制度	60
第二章 黎塞留主政时期的权力与戏剧	89
第一节 从职业剧作家到职业文人剧作家:以阿尔迪 为例	89
第二节 黎塞留与法国狂欢节官方戏剧传统	112
第三节 黎塞留主导下的戏剧规范化和正名运动	139
第四节 从“《熙德》论战”看黎塞留文人保护模式的 危机	162
第五节 从官方戏剧美学到职业戏剧美学:以“两难” 处境为例	175

结论	191
引用文献	196
人名索引列表	203

绪 论

在旧制度时期(Ancien régime)的法国,权力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相比,学界展开的研究就显得有些不足;且不说在我国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鲜有人问津,即使是在法国本土,或是在对于法国文学研究抱有相当热情的欧美国家,对此所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也屈指可数。然而,这并不妨碍研究者,甚至文学史的爱好者们,对于旧制度时期的权力与文学关系问题形成一些基于经验的想法。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当时绝大多数文人而言,权贵们的器重和扶持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况、社会地位,也影响了他们在创作上的选择。这种判断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政治体制,即绝对君权的认知。在一个等级森严、王权至上的社会里,权力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自上而下、保护和被保护、操控和被操控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否一定是垂直的、单向的?至少,活跃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剧作家皮埃尔·杜里耶(Pierre Du Ryer),在他的一部悲喜剧的“献辞”里曾表达过不同的看法。将这部题为《卡拉里热纳》(Clarigène)的作品呈献给了自己当时的保护人——旺多姆公爵(Duc de Vendôme)凯撒(César)的儿子梅克尔公爵(Duc de Mercœur)路易(Louis)。我们可以在“献辞”里读到这

样一段话：

到那时^①，我诗文的力量便能匹配您的壮举，我也能让大家知晓，君主不可无诗人，就像诗人不可无君主。我将让后人见识您此世的英勇，【……】您的荣耀将让我的诗文备受珍惜，我的诗文则会让您的荣耀受人膜拜。^②

显然，杜里耶此处强调的是文人与保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前者固然需要后者的扶持，但后者若是想要流芳百世，却也离不开前者的文字。这一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以龙沙和杜贝莱为首的法国诗人们就已经把广义上的文学（lettres），或者可以称作“文字创作”，上升到了立国之本的高度。在他们眼中，君主在文人保护上的作为是评判其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准。

不同的是，始于亨利四世执政时期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让法兰西在十七世纪一步步迈向绝对君权。那么，在权力的高压下，文学与之平起平坐的理想是否能真正实现，并且得以维系呢？文人是否就此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呢？“太阳王”路易十四光环笼罩下，被伏尔泰称为“伟大世纪”（grand siècle）的十七世纪，是否就是文学和文人彻底从属于政治，成为权力附庸的开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

① 在这段引文之前，杜里耶刚谈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在演出时受到了观众的追捧，但只有当纸质版的剧本也得到梅克尔公爵的认可，他才能获得彻底的满足。

② 本书中所有法语引文均为笔者所译，为保证学术性，特在脚注中附上相应原文。由于原文为法语，因此引号的使用也以法语标点体系为准，即使用“《》”。《Ce sera alors que j'égalley la force de mes Vers à la grandeur de vos actions, & que je sçauray faire conaistre, que le Poëte est necessaire au Prince, autant que le Prince est necessaire au Poëte. Je feray voir aux autres siecles ce courage heroïque qui vous fait admirer au nostre. [...] Vostre gloire fera cherir mes Vers, & mes Vers feront adorer vostre gloire.》Pierre Du Ryer, *Clarigène*, Paris: A. de Sommaville, 1639, 《Epistre dédicatoire》。“献辞”无页码。

视:与王权的日益强势并行的,是十七世纪书籍市场的逐渐繁荣,而这,是否会为文人开辟出一个独立于权贵阶层的垂直保护,带有职业化色彩的生存空间呢?无论想要解答上述哪一个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十七世纪留存至今的史料却又参差不齐,远不足以全面覆盖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我们也很难完整地勾勒出文人保护问题的演变路径。更为实际的做法,是选取十七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时期展开深入研究,而选择的最重要前提,自然是史料的多少。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的名字随之浮现。

当然,笔者所关心的,并非黎塞留的整个政治生涯,而是从1624年,即他进入国王咨议会(Conseil du Roi)那一年至其离世的1642年这十八年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黎塞留稳步迈向权力的巅峰,成为权倾一时的总理大臣(ministre principal),实际影响力一度甚至盖过了身为国王的路易十三。同时,这也是法国书籍出版业的第一个繁荣期,在图森·杜·布莱(Toussaint du Bray)、弗朗索瓦·塔尔加(François Targa)、安托万·德·索马维尔(Antoine de Sommaville)、奥古斯丁·库尔贝(Augustin Courbé)等一众巴黎出版商的努力下,文集(recueil)和剧本的出版达到了高峰,不少文人因此而声名鹊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黎塞留在法国文学史上所留下的文人保护者的美名。黎塞留主政的这一时期,法国王权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基本实现了从地方权贵割据向中央集权的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文人保护模式的演化,早期依附藩王的文人们纷纷向王权靠拢,并初步形成了王权主导下的国家文人保护制度的初始形态。所有这一切,都与黎塞留在背后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

黎塞留在文人保护领域的贡献之所以广为人知,得益于留存至今的丰富史料。首先便是如今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量的十七

世纪图书。其中,对笔者研究帮助最大的是文人保罗·佩里松(Paul Pellisson)写于1652年的《法兰西学院历史漫谈》(*Relation contenant l'histo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①,以及以《夏普兰书信集》(*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为代表的诸多文人书信集^②。前者完整地回顾了法兰西学院这个象征了法国国家文人保护制度的特殊机构的缘起和创建过程;后者则是忠实地记录了十七世纪的文人生活,其中大量涉及了文人与权贵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就书信集而言,无论是以作者在十七世纪文人世界的地位而言,还是从他在文人与权贵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出发,抑或是考虑书信保留的完整性,《夏普兰书信集》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同样重要的是,让·夏普兰生前曾明确拒绝出版自己的私人通信,而他的许多文人同行对此却并不避讳。在夏普兰的这一选择背后,我们不止应该看到他对于个人隐私的重视,更应该意识到,这些信件很有可能记录了十七世纪文人生活中许多敏感、关键的细节,以及作者不愿公开的个人立场。幸运的是,它们的手稿都得以完好地留存,今天的研究者依然可以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进行查阅。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学者塔米赞·德·拉洛克(Tamizey de Larroque)整理出了夏普兰书信中与文人活动相关的部分,进行誊抄编辑,以上下两卷四开本的形式出版^③。这一十九世纪版本的《夏普兰书信集》和其他一些十七世纪出版的书信集一样,如今都能在国家图书馆开发的电子书库(Gallica)里在线浏览或者下载阅读,大大方便了法国本土以外的研究者。

① Paul Pellisson, *Relation contenant l'histo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Paris: Augustin Courbé, 1653.

② 除此之外,十七世纪出版物里所包含的诸如“献辞”“前言”这样的辅文也给笔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③ Jean Chapelain,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publiées par Ph. Tamizey de Larroqu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0.

二十世纪初,法国学者乔治·高拉斯(Georges Collas)在撰写夏普兰的传记^①时,就大量查阅了后者的书信。传记的标题朴素清晰:“十七世纪的一位诗人和文人保护者”。从这一标题可以看出,高拉斯一方面将夏普兰的身份定义为诗人(文学),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夏普兰在文人世界和权力阶层的沟通过程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政治)。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法国历史学者克里斯蒂安·朱奥(Christian Jouhaud)再一次系统研究夏普兰书信时,却试图重新定义夏普兰文人生涯的意义。在朱奥看来,夏普兰是“因为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才成了文学理论家和诗人”^②。换言之,文学是夏普兰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为此,朱奥还专门引用了1637年11月4日夏普兰写给好友让-路易·盖·德·巴尔扎克(Jean-Louis Guez de Balzac)的信中的一段话加以证明:

先生,请相信我,我本就不值一提,我所做之事更是微不足道。世人强行将我视作一位大诗人,这非我本意。即使我没有完全处在诗人的对立面,我也不希望别人如此看待我。【……】依我所见,生活中最坚实之物,要算是人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真诚的自我评价了。一个理性的人也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匹配的赞誉而沾沾自喜。正是这一点让我无法将自己抬升到我的友人们,尤其是您(因为您比他们更具权威)所赋予我的高度;如若不然,后人将会震惊,为何一个如此伟大的人却会遭

① Georges Collas, *Un poète protecteur des lettres au XVII^e siècle: Jean Chapelain*, Paris: Perrin et Cie, 1912.

② 《Parce qu'il avait un extraordinaire talent pour la politique, il est devenu théoricien littéraire et poète.》Christian Jouhaud, *Les Pouvoirs de la littérature: histoire d'un paradoxe*, Paris: Gallimard, 2000, p. 149.

友情蒙蔽至此。^①

这段带有明显自谦色彩的陈述被朱奥当作了夏普兰否认自己诗人身份的证据。在朱奥看来，此时的夏普兰正饱受被“撕扯”之苦：一方面，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一方面，他却不得不按照1630年代逐步确立起来的文学创作“规则”（*règles*）来完成一篇以圣女贞德为主题的宏大史诗^②，因为他自己就是“规则”写作的重要推动者，并且因此赢得了声名，被权贵尤其是黎塞留委以重任。然而，文学在夏普兰眼中真的只是助其平步青云的工具吗？他真的如此厌恶创作吗？

不得不说，朱奥的引用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在同一封信里，夏普兰还写下了以下这两段话，而它们就出现在上述引文之前：

我将永远为我所失去的而感到哀伤，因为如果一直拥有，我便能一直愉悦，我不应当停止缅怀，除非我否定自己对她的重视^③。但我不会再哭泣，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以免延误了《少

① 《Croyés moy, Monsieur, je suis peu de chose et ce que je fais est encore moindre que moy. Le monde par force et contre mon intention me veut regarder comme un grand poète, et quand je ne serois pas tout le contraire, je ne voudrois pas encore que ce fust par là qu'on me regardast. [...] J'esprouve, quant à moy, qu'il n'y a rien de si solide dans la vie que l'estime sincère que nous faisons de nous mesmes par la connoissance que nous en avons, et qu'un homme de bon sens ne peut se contenter des acclamations qu'il sçaura n'avoir méritées. C'est ce qui m'empesche de m'eslever dans la réputation que mes amis, et entre eux vous plus que tous, pour ce que vous avés plus d'autorité qu'eux tous, m'avés donnée, de laquelle la postérité vous demandera conte, et s'estonnera qu'un si grand homme se soit tant laissé aveugler à l'amitié.》Jean Chapelain,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p. 174.

② See Christian Jouhaud, *Les Pouvoirs de la littérature; histoire d'un paradoxe*, p. 149.

③ 夏普兰此处所哀叹的是前不久离世的隆格维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ongueville），他的保护人之一。

女》^①的写作进程。【……】

因此,《少女》将不会为这一点所累,真正拖累她的,是占据了整整六个月时间的那些突如其来的工作,以及巴黎的种种礼节和客套说辞,它们终会让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去往荒无人烟之地静静地看护她。然而,到我写完第二十四章之时,这一切又将会怎样呢?可能最终我绞尽脑汁,换来的也只是民众的嘘声,以及不自量力的、弱者的名声。^②

夏普兰的真实想法在这两段文字里表露得已然十分明显:以圣女贞德为主题的史诗写作对他而言非但不是苦差,反而是他真正的乐趣所在,倒是那些打断了他创作的,“突如其来的工作”,让他不胜其烦,而这些工作,指的显然就是黎塞留指定夏普兰所主持的,以法兰西学院名义评判《熙德》(Le Cid)^③一事。事实上,夏普兰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曾多次向友人吐露自己对于被迫介入“《熙德》论战”的不满^④。如果他真如朱奥想象的那样,是个政治仕途为先的文人,那么是否应该庆幸黎塞留对他委以重任,而非像信中那样诸多抱怨呢?

① 指以“奥尔良少女”贞德为主角的史诗。

② 《Je seray toujours triste de ce que j'ay perdu pour ce que j'eusse toujours esté gay en le possédant et je ne dois point cesser de le regretter si je ne veux condamner l'estime que j'en ay faite. Mais je ne pleureray point et ne m'abbatteray point de telle sorte que la Pucelle puisse en estre retardée dans sa course. [...] Ce ne sera donc pas de ce costé là que la Pucelle souffrira, mais du costé des emplois extraordinaires qui me viennent et qui m'emportent des six mois entiers, et du costé des compliments et civilités de Paris qui me feront enfin résoudre de quitter la ville et d'aller chercher le désert pour la gouverner en paix. Après tout néanmoins, que sera-ce quand le vingt quatriesme livre seroit achevé? Je me seray sans doute bien rompu la teste pour me faire siffler par le peuple et pour m'acquérir la réputation de téméraire et de foible.》Jean Chapelain, *Lettres de Jean Chapelain*, pp. 173-174.

③ 《熙德》是一出悲喜剧,为法国十七世纪戏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成名作,1637年初首演后大受欢迎,并于同年引发一场大规模论战。

④ 笔者会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详细论述。

更重要的是,夏普兰并不是当时唯一对于介入“《熙德》论战”持保留态度的文人,比如宫博(Gombauld),也曾在他的信中表达过类似的立场。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黎塞留主政时期王权日益强势的背景下,权力和文学之间,也并非单向的垂直统治关系。诚然,在国家文人保护制度逐步确立的1630年代,文人免不了向黎塞留所代表的中央权力献礼,以示忠诚。但正如杜里耶在上文引用的献辞里所说,这种建立在写作基础上的服务恰恰证明了文字和文学的力量。对于如何处理和王权之间的关系,文人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对于正在成型的国家文人保护制度,文人们也有着自己的认识。而这些,都建立在捍卫而非摧毁一个体面的文人阶层的基础之上,牺牲文字,或者说将写作彻底工具化以换取仕途,并非以夏普兰为代表的文人们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上文所提及的这些史料出发,重新梳理从1624年黎塞留进入国王咨议会到他1642年去世这十八年间,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思考王权如何一步步将文人纳入自己的保护体系,也探究在书籍市场日益壮大,文人团体层出不穷,文化“沙龙”^①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如何在王权面前保持自由生长的可能,直至反过来影响官方的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剧是一个极佳的个案研究对象。法国的十七世纪通常被称为戏剧的世纪,而正是在黎塞留主政时期,法国戏剧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这首先与黎塞留本人对于戏剧的热衷有关,正是在他的扶持下,许多原先对于戏剧并无兴趣的文人才会投身到剧本写作中来;同时,以夏普兰和多比

① “沙龙”(salon)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名词,十七世纪通常把这类文化场所称为“ruelle”,也就是当时巴黎的私人公馆(hôtel particulier)里,贵妇们接待密友和文人的一个经过精心装饰的空间。但沿用“沙龙”一词显然更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

尼亚克院长^①(l'abbé d'Aubignac)为首的戏剧理论家也才能在1630年代迅速成名,并为戏剧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官方戏剧传统的形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早在黎塞留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以前,法国戏剧就已经进入了全新的职业化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文学创作和舞台表演的结合;二是职业文人剧作家群体的出现。介于传统文人和职业作家之间的这个群体,是文人阶层里的一种特殊存在,他们和王权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富研究价值的、双向、互动的关系。

① 多比尼亚克院长是与夏普兰齐名的戏剧理论家。他在1657年出版的理论著作《戏剧法式》(*La Pratique du théâtre*)成为法国古典主义剧作法最重要的理论作品之一。

第一章 中央集权化道路上的 权力与文学

第一节 从“书信集”出版看 1620 年代 黎塞留与文人世界的关系

黎塞留首次以文人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论战有关。这场论战史称“《书信集》论战”(Querelle des *Lettres*)。论战的焦点是 1624 年出版的一部名为《巴尔扎克先生书信集》(*Lettres du sieur de Balzac*)^①的作品,作者是日后被文人们视为文学评鉴大师的让-路易·盖·德·巴尔扎克(Jean-Louis Guez de Balzac)^②。缔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法语散文创作巅峰的,也正是此人。无论是对于黎塞留还是对于巴尔扎克,1624 年都不同寻常,前者在这一年进入了法国中央政治决策

① Jean-Louis Guez de Balzac, *Lettres du sieur de Balzac*, Paris: Toussaint du Bray, 1624.

② 下文简称盖·德·巴尔扎克。

核心部门“国王咨议会”(Conseil du Roi),并迅速成为首席咨议大臣^①;后者则出版了自己文人生涯中的第一部作品,这次出版对于盖·德·巴尔扎克而言意义非凡。

1624年的他,是一个希望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文人。然而,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法国,出版作品却并非文人赢得社会知名度的最佳方式,社交活动对于文人自我身份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何人结交,隶属于哪个贵族家庭,享有何人的保护赞助,这些都在当时法国社会评价文人的标准之列,因此文人们频繁出入于各类学究团体、文化沙龙和贵族宫廷。与这些社会活动相比,出版对于文人彰显身份的作用就小了许多。因为在当时的出版物上,仅有正文前的辅文有可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这类辅文以献辞为主。献辞是作者为了将作品公开进献给某位达官贵人而撰写的一封信,内容往往会涉及作者与接受献辞者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说,这为公众了解作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然而献辞写作的固定修辞风格,以及对于受献人的过度吹捧,为这类文字的可信度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献辞之外,出版物上偶尔也会出现文人同行的署名赠言或者“告读者书”,前者有助于作者展示自己的交际圈,后者在解释作品诞生过程的同时,为读者更好地认识作者提供了可能。然而,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对于文人身份构建的作用还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们往往会选择在纸质书出版之前,频繁地出入各类社交场合,诵读自己作品的选段,与文人雅士相互交流、品评。这种口头的、碎片式的传播方式比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更有助于作者在文人圈内立足。尽管如此,年轻的盖·德·巴尔扎克依然选择了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自己的书信集。他的用意究竟何在呢?

① 1624年4月29日,黎塞留进入咨议会,8月13日晋升首席咨议大臣。See Françoise Hildesheimer, *Richelieu*, Paris: Flammarion, 2004, p. 532.

不可否认的是,在十七世纪初年的法国,书信集和诗文集风靡一时,成了出版商眼中的宠儿。然而,《巴尔扎克先生书信集》却与其他同类出版物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书信体写作并非真实的书信写作,而是借助书信的形式或吟风弄月(lettres galantes),或道德教诲(épîtres morales),或慰藉友人(lettres de consolation)。而盖·德·巴尔扎克的集子里所收录的,却是他和友人、师长之间的真实通信,至少是以真实通信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字,换句话说,这些书信都有真实存在的收信人,也都被附上了日期。当然,法国也并非没有真实书信结集出版的例子。比如十六世纪著名人文主义学者艾田·帕斯基耶(Estienne Pasquier)的个人书信集就多次再版,直至1619年,也就是后者去世后四年。在法国学者马蒂尔德·蓬巴尔(Mathilde Bombard)看来^①,依照法国人文主义的传统,出版书信集是一个文人功成名就的标志。公众希望通过阅读书信了解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对于某些人和事的经验之谈,晚年的帕斯基耶就符合这样的要求。反观盖·德·巴尔扎克,年轻的他尚没有任何经验和成就可以支撑他出版自己的书信集,然而他却偏偏选择了这种与自己身份严重不符的方式迈出了踏入文坛的第一步。依笔者所见,盖·德·巴尔扎克表面的轻狂和不自量背后,是一场围绕出版展开的精心策划的自我宣传运动。

首先,从1624年结集出版的这些书信来看,年轻的盖·德·巴尔扎克在文人社交上已经有了不错的积累,他受当时法国天主教阵营的头面人物之一艾博农公爵(Duc d'Épernon)的保护,与公爵的儿子拉瓦莱特枢机主教(Cardinal de La Valette)交往甚密,并和后来成为黎塞留亲信的博瓦罗贝尔(Boisrobert),以及其他隶属于法国王太

^① See Mathilde Bombard, *Guez de Balzac et la querelle des "Lettres": écriture, polémique et critique dans la France du premier XVII^e siècle*, Paris: H. Champion, 2007, p. 38.